

「國際化」大專院校「兩文平等」觀察 「英文文化」？

中文和英文，均是香港特區的法定語言。加之普通話的影響逐步上升，形成了目前人所共知的「兩文三語」格局。兩文（中、英文）平等，這一觀點在法律上固然沒有異議。然而，離開法律層面來觀察本港社會，尤其是在大專院校，要實現中英兩文的徹底平權，還有許多值得努力的空間。
文：謝婉玲 圖：資料圖片



錢穆一直致力於推動中文的保護。



本港大學生研習中國文化。



楊汝萬教授認為，英文推廣要視乎不同專業。



中文學術期刊。



母語教學材料。

本港大學，以英文為主要的行政、授課及研究語言，是基於歷史形成的。這其中，既有殖民時代的因素，也有追求國際排名、順應國際化潮流的考量。英文在大學中的主導格局，自有其理由，但其邊界，則是應保證中文在相應學科、課程中的地位，這也是兩文平等的核心要求。

「英文化」下利益受損

國際化，是香港確立大學優質教育和人才培養的關鍵。尤其是回歸以來，香港的大學能夠發揮「既在國內，又在境外」的優勢，使得英文成為大學的語言核心。來到香港留學的中國內地學生，在香港的全英文環境中，鍛煉了英語能力。但是，不少學界人士認為，英文的廣泛使用應當有邊界可循，不能打破兩文平等的架構，更不能因為為了追求國際化而忽略不同專業的學科差別。

香港身處華人社會，又經歷過英國的殖民時代，中文和英文形成並存格局，是有歷史原因的。本港的不少大專院校亦立足於「兩文並行、突出特色」的原則，在確保「全英文」的授課研究環境的同時，也凸出中國文化的特徵。這一理念，在系科專業的設置上，尤為明顯。例如，香港理工大學的中國文化研究系便與傳統的語言學系相分離而設立，以保證純粹的中國文化研究能夠在中文語境中進行。

但也有本港大學的教職員反映，中國文學、語言、文化課程的授課語言是中文，但如果該課程的科目是面向中文專業以外的學院或整個大學的學生開班時，則必須得改用英文。因為在全球化下，班裡可能有一個或者是兩個國際學生，那麼為了遷就這一兩個國際學生，講堂課的教學語言便必須轉為英文。但是基於中文的性質，如教授唐詩、宋詞等，並不只是講解內容那麼簡單，詩詞的韻律和所塑造的情感或意境，最適合的仍是用中文講解。且目前歐美都有學習中文、普通話的熱潮，在與中國文學、語言相關的課程中，以中文作為教學語言，絲毫不會影響學校的國際化。更有受訪者認為，目前的香港大學教育，雖然號稱國際化，但所謂的「國際化」，只是美國化而已。一切學術標準（包括升遷制度）只跟隨美國，而校園的交流語言只有英文。

這樣的現象，導致了中國文、史、哲研究不被重視，最為明顯的便是資源分配的不均衡。以某校西方語言學為例，其教職人員在申請內部研究經費時，動輒就是獲批十幾萬或者是數十萬。但中國文史哲領域的教職員申請的情形恰恰相反，要麼不批，要麼就只有三、五萬。

目前一些學校系科的評核教職員之升遷與否，是依據所發表的論文是否被刊在SCI/SSCI/AHCI名單裡的刊物。這些由英美國家制定的期刊索引，主要是切合理工科或社會科學的學術研究。但很多時候，這套制度會被生搬硬套在中國文史哲研究者身上。如此一來，以中文發表的論文，儘管是發表在中國內地、台灣或香港最好的刊物上，但由於用中文寫作，往往會被看作是沒有國際影響力，從而導致研究人員的心血白費。有研究國學的教師反問：學者研究中國文學、哲學和思想，究竟是為歐美的少數漢學家服務，還是為了數以億萬計的華人和海外的中文學習者服務呢？

英文推廣不可忽視專業差別

現任職於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的楊汝萬教授，曾經在香港中文大學擔任了四年的教務長、八年的系主任、十八年的亞太研究所所長，堪稱本港學界前輩和元老。他提到，中文大學在建校初期，一直奉行中文為主的方針，對入學的學生均會有較高的中文水平要求；97回歸以來，大學之間的競爭日趨激烈，在國際化的背景下，中大開始實行雙語並行的政策，學生不但要中文好，而且要掌握較為不錯的英文。楊汝萬教授進一步分析到，就一般情況而言，英文成為大學研究人員的主要工作語言，很大程度上源自於論文發表機制，因為國際公認的期刊，基本上是英文文獻。教職員之工作評鑒，有時也依據所發表的論文是否被刊在SCI等國際學術期刊名錄中。在授課語言方面，為與國際接軌，也會多使用英語。

但無論是授課還是研究，楊汝萬教授都認為，語言的選擇要依據不同的專業、課程的實際情況而定，實行「個案原則」，分析不同專業、課程的具體情形。他特別提及，中文課程，牽涉到中國文學、歷史、文化、哲學的課程教

學以及研究，還是應以中文為主，這樣較為符合學科的特點與要求。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專家黃道炫教授也非常不認同將英文學術規範和標準擴展至與中國文化、文學、歷史、哲學相關的教研領域。他認為，中國文學、哲學、歷史，尤其是文學、哲學，許多概念是生成於中國的語言之中的，常常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關係，很難想像如離開了漢語語境後，該怎樣去講解這些概念。每一種語言背後都包含着這個語言區的文化，除非要拋棄這種文化，否則怎麼能想像要丟掉其語言來講授相關專業內容，在他看來，這種做法簡直不可思議。

慎重對待兩文差異

有學者提及，中國文學、歷史、哲學、語言學等專業，在美國等英語圈根本就是高度邊緣的學科，故而其學術期刊名錄並不能完全反映「中國學」的研究現狀；此外，日本的漢學研究處在學界公認的前列，但他們並不看重歐美的學術期刊名錄在漢學研究領域的意義。真正的國際化，一是重視包含英語圈在內的所有外國文化，盡量增加其他外語的教學，對他者文化保持尊重；其次，是確立和發揚自我的民族文化主體性，這是實現國際化的基礎。

有法律界人士認為，中文和英文的平等地位，是《基本法》以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所確定的。《基本法》第九條明定中文是香港特區的正式語言，而國際公約則明確禁止了語言歧視。如果在升等、續約等問題上，特別是在中文類學科中出現語言歧視的情況，或者是出現以語言進行資源分配的標準，確已有干犯法例的嫌疑。

香港無論怎樣追求國際化，始終都處在華人社會的文化圈中。對待中文和英文形成的差異，不能夠簡單單單以英文文化的方式去進行「一刀切」式的處理，而是應當慎重對待不同學科的差異，並建立在漢學研究領域的獨立學術標準體系。同時，以開放和多元的態度尊重不同文化，並且積極尊重學術研究本身的價值，只有做到這樣，香港未來的人文學術發展才會有更堅實的成果。

語言平等，需要真正的「費厄瀆賴」

文：蔡曉斌

「費厄瀆賴」，是晚清及至民國，中國知識分子對英語fair play（公平競爭）的中文譯稱。在那個崇尚啟蒙的年代裡，西學與各種外來思潮進入中華。較之於傳統思維中的「成王敗寇」，fair play（公平競爭）所代表的程序正義、規則意識、平等精神以及博奕中的君子風範，頗受當時中國文人的推崇。此外，文人們深知中國文化和語言的傳統，所以用音譯的方式，將fair play口語化為中文的「費厄瀆賴」。久而久之，「費厄瀆賴」就成為公平競爭與平等精神的漢語代名詞。魯迅先生就曾在其《論「費厄瀆賴」應該緩行》一文中，積極肯定了「費厄瀆賴」的內在價值。

數年前，中國內地某學者按照純正英語的發音規則，將Chiang Kai-shek翻譯為「常凱申」。一時間，輿論嘩然。因為，Chiang Kai-shek其實就是中國現代史上有名的人物——蔣介石。不少網友指責：連蔣介石都不知道，還搞什麼中國歷史研究？這次事件，也促使中國內地的文史哲學界，對「英文至上主義」的思維和做法，進行了深刻反思。

不難看出，若以英文的視角來翻譯Chiang Kai-shek，則「常凱申」確實是較為準確的讀音譯法。但是，若從中國歷史、文化的專業視角去進行比較學術研究，則無論如何都不能不知道蔣介石的中英文姓名為何。中國文學、歷史、文化、哲學的研究，需要國際化，也需要與全球接軌，更需要跨學科、多領域的比較和借鑒。但是，這樣做的前提，是不能夠放棄中國文學、文化、歷史、哲學的核心與根本——「中國性」。而中文語言，就是「中國性」的重中之重。如果說，為了所謂的「國際化」而消解了中國文史哲專業的特質與核心，則本港大專院校中的中國文史哲專業，也最終會走向衰落。

據悉，本港部分人熱衷於使用英國宮廷式英語，以此顯現自己與一般香港人的不同。魯迅先生就曾對這樣的「高等華人」頗不以為然，稱其為「西崽」——「西崽」在國人面前，顯現所謂「高貴」，張嘴就是ABC，出言必「國際、現代、文明」，將自我打扮為進步的圖騰；在洋人面前，則賣弄些許淺顯的四書倫

常、孔孟之道，成為了中國文化的代表。以現代視角看，「西崽」可能早已演化為「洋奴學閥」式的利益結構群——以「英語至上」為理由，來掌握從事中國文史哲研究的教職員之續約、升遷和加人工；為了一個兩個來香港留學的歐美學生，就削足適履，將整個中國文史哲課程的授課語言，從中文改為英文。嚴格說來，這就是全球化下的自我殖民化。

除了利益壟斷，思想方面的壟斷也令人憂慮。語言是思想的載體和工具。一個博士生要撰寫中國文學或文化方面的論文，則表達思想的重要性遠遠超過語言選擇的重要性。畢竟，中國文化與中文語言相互依存。若以一個人不懂英文而不讓其撰寫中國文化或歷史方面的論文，其理由確實不可思議，也著實剝奪了他人表達思想的自由和權利。

我們需要國際化，但國際化不等於英文化。中文也是聯合國五種工作語言之一，而且是世界上使用人數最多的語言。若論及廣泛程度，則當今華人的分佈也遍及全球。在本港，中文更是《基本法》明定的特

區正式語言。華人是香港社會的一分子，中文作為日常生活、工作行政的媒介工具，地位毋庸置疑。要真正走向國際化，學習英文的同時，那些從事中國文史哲研究的學者，更應在國際化的大潮中，推廣中文、推廣中國文化，這才是華人知識分子應有的民族身份自覺；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費厄瀆賴」式的國際化。

國際化，更為重要的是理念與人文素養的普世化。著名的英國新自由主義理論大師哈耶克（Friedrich Hayek）認為：要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平等與公正，就必須依據不同事物的特性，去差別對待不同個體。同樣，要實現本港的中國人文學術領域的飛躍發展，則不能夠簡單用英文思維主導下的學術標準去衡量中國文史哲領域的教學和研究。中國文史哲領域的授課和研究，自然應當依據其學科特性，完善中文類的系科專業的合併與分立，並以中文作為授課語言和研究媒介。這才是真正的「費厄瀆賴」。而我們實現中文、英文的雙語平等，也需要這樣真正的「費厄瀆賴」。